

库

中国

民间文化

探索丛书

ZHONG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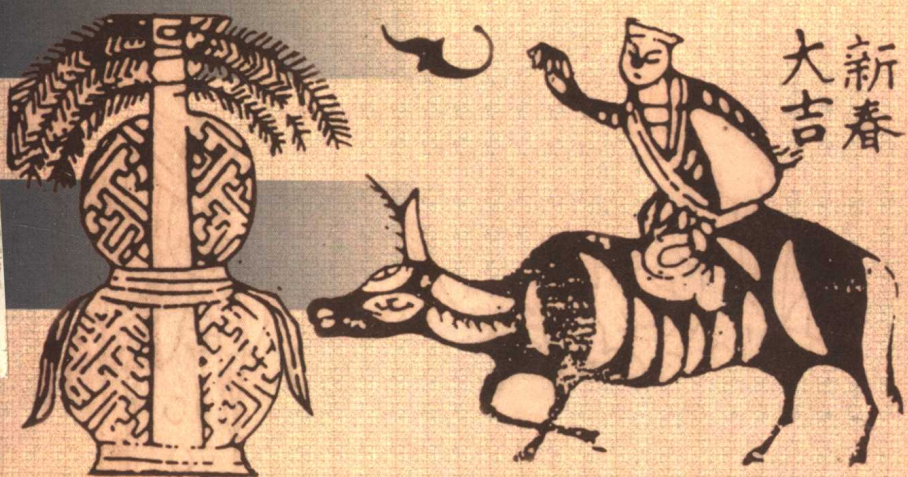
MINJIAN WENHUA TANSUO CONGSHU

《荆楚岁时记》研究

——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

萧放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春大吉



JINGCHU SUISHI JI YAANJIU

谨以此书献给恩师钟敬文教授

JINGCHU SUISHIJI YANJIU

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

《荆楚岁时记》研究

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

ZHONGGUO MINJIAN WENHUA
TANSUO CONGSH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
萧放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ISBN 7-303-05686-6

I. 荆… II. 萧…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中国②时间-
观念-研究-中国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652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牛栏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125 字数:229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5.00元



总序

(一)

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为满足一定群体生存、发展的要求，而产生、存在、传承和演变的。民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它当然也是遵循着这种规律而产生和发展的。

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紧贴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

从考古学上的资料看，远在旧石器时代，在那些过着原始生活的人群里，就有一些最简单的习惯存在，即后来民俗的幼苗存在。随着他们生活的不断前进，原始的习惯就更加增添和巩固起来了。

人类群体在进入有文字、制陶术、冶金术的所谓文明时期的社会后，这种风俗、习惯，当然就会随着社会脚步不断前进。同时，由于群体的分化（阶级产生），本来全民性的风习，也随着产生了一定的分化状态。但是历史沿袭下来的习俗，在整个民族文化生活中，仍然是主体，是基础。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在广大的农村、小市镇的民俗文化状态基本

上还是如此。

在已经进入文明时期的社会，上层文化的保存和继承，大都凭借文字记录。但是广大民众没有学习和使用文字的机会，他们的民俗传承，只有依靠历史因袭的形式，即行动传承、口头传承和心理传承。这些传承往往是互相关联和交错的。这种传承方式形成了民间文化的重要特点——与文籍文化相对立的民间传承文化。

民俗文化是对应群体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到各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它们而产生和存在的民俗文化的机能，自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独一的。但是，这种功能概略地总括起来，不外两点——顺利生活和轨范生活。

（二）

民俗学，是以上述那种文化为对象而进行考察、描述和研究的学问。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学，虽然历史不到百年，但是它的史前史却是源远流长的。

仅从历史文献看，我国在先秦的载籍中就有许多关于古代民俗事象的记录或断片的论述，甚至于有比较集中的资料辑集，如《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和《山海经》。东汉、西晋以来，

关于民俗的谈论和描述著作就相继出现了。到了宋、元时代，不仅本土的民俗著作不断涌现，连关于域外的民族地区的民俗记述著作也相继刊行了。中国这方面著述的丰富，恐怕在世界上应该是名列到前茅的。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诞生于本世纪一十年代之末（1918年）。它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翼而产生和存在的。它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历了八十年的岁月。

中国民俗学的经历，虽然总的说来，是在前进，但行程上却是相当曲折的。二十年来，由于学术环境的宽舒，学界同志们们的热心努力，这学科已然呈现出喜人的景象。

当前，我们这个学科，各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学术机构遍立于各省市，专业人材队伍扩大和加强了，各种层次的著作也都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中。更使人高兴的，是这个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科，被教育部正式列入高等院校（包括研究院）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科目中。民俗学一时差不多成为了时代的“显学”。

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立已经四年。它是一个专门培养民俗学人材和进行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机构。这套丛书就是它的成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成果并不十分成熟。但我们从事学术的心是诚挚的，进行研究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如果这份学术的礼物，能够作为一捆柴、一把草，投向正在熊熊燃烧的民俗学的洪炉中，为它增添一股热力、一点火焰，那就是我们的无上光荣了。

钟敬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于北师大

时年九六

内 容 提 要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的第一部岁时民俗志，它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作者宗懔为南朝梁人。本书以《荆楚岁时记》为文本，研究它在中国民俗学史、中国民俗史上的独特贡献，以及它在记录中国民众时间观念演变史上的重要价值。

本书围绕着《荆楚岁时记》成书的时代背景与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从五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荆楚岁时记》的作者、注者及版本情况作系统的考订；本书写成于宗懔被俘往北朝之后，是作者对故乡岁时生活的追忆之作，从而开创了忆旧的民俗记述传统。
二、将本书放在历史时间与地域空间的确定位置上，进行文化考察，探讨了本书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认为在秦汉帝国崩溃之后，六朝民众生活出现了新的变化，民众注重个体情味，地方文化观念凸现，民间著述兴起，《荆楚岁时记》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私人著述。
三、本书将《荆楚岁时记》视作民众时间观念的文本，认为中国一向有时间记述的传统，古代的《月令》是时间进程的政令性叙述，六朝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统的政令性时间叙述中断，传统月令被新兴的地方岁时记代替。岁时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记述了地方民众的时空生

活，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时间叙述性质，从王官之时到百姓日用之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四、《荆楚岁时记》作为中国第一部岁时民俗志，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发凡起例的开创意义。中国民众有着很强的时令观念，岁时民俗丰富多彩，岁时记的著述体例为岁时民俗的记录提供了适用的记述方式。从《荆楚岁时记》的著述体例与记述原则中，提出关于传统民俗志的若干认识。五、六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代，作为地域民众岁时实录的《荆楚岁时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因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料，从中发现民间社会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本文还拟研究民俗文献与民俗活态传承扩布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时间的局限，此项内容暂时搁置，容后日补足。

总之，《荆楚岁时记》以其对特定历史时空的理解与把握，奠定了它在中国民俗学史与中国民俗史上的学术地位。

序

钟敬文

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在中国已走过了八十余年的历程，虽然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与坎坷，但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民俗学事业，毕竟已由幼嫩的新芽成长为今天枝叶繁茂的大树。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民俗学的资料建设、民俗学人才培养、民俗学成果的交流与出版，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而且在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今天的民俗学盛况，是本世纪初的民俗学运动所不能比拟的。

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有着较强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国民俗学在起步与初创期明显地受到国外民俗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但从学术背景看，这门学科是在五四的科学、民主和民族觉醒意识这三者影响下成立的。我们的民俗学有自己的文化特性与历史渊源，因此说，中国民俗学有着独特的性格，有着独立的学术品性，这种学术性格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很早就有了人们所熟知的采风问俗的政教传统，同时有关民俗的记录与整理工作在古代也有着显著的体现。在记录与整理民俗资料时，人们不仅依靠一定的民俗理解去组织资料，并且，在叙述民俗时，常有对民俗事象的解释评说，这种对民俗的理解与评论正是古人民俗观的体现。从《诗经·国风》、诸

子百家之言，到两汉史书都有关于民俗的见解与民俗记述，此后 2000 年间，无论是理论的民俗学，还是记录的民俗学，在学术上都有很多的积累。这种历代传衍的民俗记录与民俗解释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学术传统。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民俗学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

鉴于中国文化历史的实际，我一直强调中国民俗学的自主性，换句话说，要具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的意思，不应该人云亦云，依照西方理论描红格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有自立意识。如果只是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去验证外来的理论，去作它的注脚，而不是对它进行消化吸收，作为我们观察文化发展变迁的一种学术角度的话，那么我们的学术只有跟在他人后面爬行，这样下去肯定是没有多大出息的。本人认为，中国民俗学应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它包括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立场、观点论、方法论及资料学六个方面，其中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与历史民俗学尤为重要。历史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优势，我国一向有关民俗民风的学术传统，有着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这对于传统民俗的历史研究来说，可谓得天独厚。历史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有两方面，一是中国民俗史，一是中国民俗学史。当然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在古代民俗历史文献中很难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荆楚岁时记》就是这样一本古代民俗著作。由于它

在中国岁时民俗记录方面的开创意义，向来为学者所重视。我们在学者著述与地方志书中常常见到他们将《荆楚岁时记》的记述视为岁时民俗记录的源头，该书的引用率是非常高的，由此可见它在民俗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但这样一本民俗著述，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它的学术研究一直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国外的日本学者、德国学者对它有专门研究，但不一定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上的遗憾，我常常希望有中国学者对它进行民俗意义的研究，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眼前的这本书就是研究《荆楚岁时记》的专门著作。

本书的作者萧放同志，是湖北人，他历史学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有较好的历史学功底，后来在北师大中文系作过访问学者，1996年考上了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民俗学博士研究生，我作为导师，在专业指导上，结合他学养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让他在民俗学史方面用力，因为这方面一直不太为人关注，而它又是民俗学建设的重要方面。在萧放选定《荆楚岁时记》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是感到欣慰的。

萧放是荆楚故乡人，又是历史学出身，作过民俗学的访问学者（事实上，他对《荆楚岁时记》的兴趣是在这时形成的，我曾经称道过他的想法），他在湖北部分县市作过几次民俗学调查，承担过湖北民俗文化的重点课题，发表过多篇有关湖北民俗的学术文章，又在本专业经过近三年

的民俗学学习，熟悉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掌握了较丰富的荆楚历史民俗资料，因此由他来对乡邦民俗历史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研究准备来说，他都是合适的人选，正如我常主张少数民族民俗应该由少数民族学者自己来研究一样，地方民俗调查研究也应该倚重地方学者或有地方民俗体验的学者，因为他们有先天的文化优势，不存在文化的疏离感。这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是较为缺乏的。萧放同志为学勤奋，肯动脑筋。说实在话，我对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要求他在民俗史、民俗学史研究上做得更好。博士研究生学习结束时，萧放果然不负所望，写出了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在由校内外民俗学专家、历史学专家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议会上得到一致好评。作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它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很有价值。历史民俗学研究中，长期缺乏对民俗历史文献的注意，而民俗历史文献中蕴涵着丰富的民俗资料，以及前人对于民俗的理性认识，如果我们不去发掘它的学术价值，真有点对不起我们的先人。况且《荆楚岁时记》等书是民俗历史文献中的翘楚，它们不仅在中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它们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应该有一定的荣誉的位置的。萧放这部论著的意义首先在选题上具有开辟性，它是学界首次对民俗历史文献作系统的学术研讨，它是国内学者首次对《荆楚岁时

记》的专门研究。萧放同志在历史民俗学研究方面带了一个好头，他的选题既有学术价值，又在学科领域具有示范意义。

第二，论述深入、周到。这是该著作的一个突出优点。《荆楚岁时记》名气很大，且它在宋元之际亡佚，明清之后只有辑佚本传世。现存字数并不多，全文不到一万字，因此，对这样一本民俗典籍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首先要解决的是《荆楚岁时记》的底本问题，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在这方面，近人下了较多力气，国内出了三四个校注本、辑佚本，日本学者也作过辑佚研究工作，这样为作者腾出精力对《荆楚岁时记》本身的学术意义研究提供了便利。当然，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利用当前的考据成果，他在版本源流考辨中，对作品流传的文化背景，注者对正文的补足意义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萧放同志的研究业绩主要是对《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民俗史与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学术意义的抉发。他研究视野开阔，对《荆楚岁时记》产生的时代与所记述的时代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分析；对《荆楚岁时记》的学术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扒梳，正确地指出了它与《月令》、《四民月令》之间的文化变迁关系。将岁时记与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结合进行探讨，这是前人未曾作过的开创性的研究。在对大小问题的论证过程中，作者都能比较周到地作出研究分析。正如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学家何

兹全先生在评阅论文时所说：作者“分析细致，追溯源头，清澈见底。从论文涉及的方面、大小问题，都能看到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对问题起源彻底抓住不放的精神。”作者的这种深入研究精神，保证了这篇博士论文的成功。

第三，评论多有新见。正是作者的深究学风，使作者常能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作者的学术新见，主要有以下两点表现：一是将《荆楚岁时记》确定为中国第一部岁时民俗志，对它的记述原则，记述体例，记述范围，作了系统的评论，提出了关于传统民俗志的若干认识；二是将《荆楚岁时记》作为中古民众时间观念的文献记录，认为中国向来重视时间生活，有时间记述传统，《月令》是王官的政令时间，《四民月令》是贵族庄园的时间，而岁时记是地方民众的生活时间。六朝时期，传统月令被地方岁时记取代，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改变了时间叙述性质，从王官的时政安排到百姓的日常时间生活，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诸如这样的论述精义在论文时常见到。萧放的论文写得洋洋洒洒，却又深入义理，刘魁立教授评价该文说：“学风朴实，论证严谨，文字流畅而清新，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认为是一篇扎实的有创见的学位论文，何兹全先生也是这样评价的，我也有同感。

当然，作为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它不可能尽善尽

美，它的不足与其优点相伴，作者在注意对该文献出现的时代文化背景深入分析的过程中用力过多，因此对正文的民俗意义分析显得有些薄弱，对它在后世民众生活中的影响未及论述，对它在东亚地区的岁时文化记录上的范本意义也没有论及，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索和补足，从而将《荆楚岁时记》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萧放同志现正在作民俗学专业的博士后，他仍然作民俗史与民俗学史方面的题目，目前还协助我组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民俗史》的研究撰写工作。萧放为人谦和、朴实，有奉献精神，这样的学者是我们学科所需要的。

现在萧放的博士论文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他的导师与长辈，对基金会对学术著作的奖励资助表示感谢，对萧放的论文能及时出版表示祝贺，并期望他在历史民俗学方面取得更显著的成绩。

2000年8月于京郊八大处